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

李强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

李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 / 李强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1.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第 12 辑)

ISBN 978-7-5458-0312-9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北宋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475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

李 强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312-9/I·113

定 价 32.00 元

内容提要

北宋庆历之际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庆历士人忠忘其身、和而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和大胆疑经、笃于自信的学术创新意识，对后世士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本书通过对北宋庆历年间“争水洛城事”、“进奏院狱”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考索钩稽，力图描绘出庆历士风的嬗变轨迹，并对此期士风与文学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

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

序

洪本健

李强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自然是感到分外的欣慰。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宋代文学的研究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固然离不开老一辈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与辛勤正确的引领，也跟该领域诸多年轻才俊不断涌现密切相关，只要看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的队伍一届比一届壮大就能明白。李强是幸运的，他在学术上的成长恰好遇上宋代文学研究欣欣向荣之时。他大学本科阶段学的并非中文专业，但他对祖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深深的爱好，涉猎较广，又喜欢写作，为后来投身文史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李强大学毕业后，做了数年报纸编辑、电视台记者工作，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学术研究之路，于1999年报考了我的研究生。硕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后，李强又继续从我攻读博士学位。李强是勤奋的，自进入宋代文史研究领域以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诸多北宋作家的文集，也看了不少宋人史料笔记和今人有关北宋的文史专著，对仁宗庆历时期的政事与文学尤感兴趣，这与我谋而合。

我在探究北宋文学的发展时，觉得一代伟人范仲淹和文坛宗师欧阳修，在庆历年间的政治和文学舞台上都有不同寻常的表现。范仲淹

是“庆历新政”的领袖，一篇《岳阳楼记》流传千古。写于新政夭折后的这篇杰作，展现了革新者坦荡的胸怀，闪耀着崇高人格的光辉。欧阳修呢，天圣起步、庆历奠基、嘉祐辉煌是他一生文学活动的三个重要阶段。承前启后的庆历，对他和宋代文学史而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北宋的许多大臣名士，以年齿为序，诸如尹洙、梅尧臣、富弼、石介、张方平、韩琦、范镇、苏舜钦、李觏、苏洵、邵雍、蔡襄、司马光、刘敞、曾巩、王安石等，与欧阳修都是同时代人，年龄最小的与欧阳修相差也不过十四岁。这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啊！他们各以自己在政治、文学、史学、经学、军事等方面的建树为后人所景仰，载入史册。因此，李强选取庆历士风与文学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所在。李强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他汲取了学界有关成果的精髓，同时并未囿于旧说，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关于庆历年间发生的“争水洛城”、“进奏院狱”等事件，他在深思熟虑之后，都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当然这些见解是否合理，是否完善，尚有待学界的检验与批评。拒绝浮躁，不失锐气，继续探索，更上层楼，这是许多年轻学者的使命，也是我对李强最殷切的期待。

2009年12月25日于浦东康桥

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冷僻的领域,此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尚不太被人们重视,相关基础研究成果也比较缺乏。庆历之际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孕育和发展时期。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宋代实现近世转型,实际上处于北宋中期的仁宗庆历之际,恰恰是这一转型的关捩之处。

“庆历”作为北宋甚或宋仁宗众多年号中的一个,之所以能够走进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更多的原因是这一个年号与一批汲汲于国事的北宋士大夫有关,特别是庆历三、四年(1043—1044)发生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新,被认为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先声,宋史学界称庆历这场短命的改革为“庆历新政”。由范仲淹领导、诸多士人参与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庆历士人忠忘其身、和而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和大胆疑经、笃于自信的学术创新意识,却得到进一步树立和发扬,对后世政治、文学以及士人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往往以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价值尺度来衡量“庆历新政”的历史意义,笔者所见的文学

史或其他专题史著作，凡涉及北宋庆历之际的阐述，大都采取这样的观点。实际上这样的观点由来已久，甚至已经逐渐构建成我们的历史常识。

学界对庆历之际的历史判断当然没有问题，但这样的历史常识真的能够清晰地描绘出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逻辑吗？社会转型和士人思想演进过程中的细部运作又呈现何种形态？被构建了近千年的历史常识在新的历史环境与研究视野下，又有哪些未发之覆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的心中，成为我研究北宋庆历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现象最初的学术动力。“庆历新政”发生的两年间，北宋王朝同时发生的几个影响帝国政治走向和文人心态发展的重大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北宋士风嬗变的绝佳视角。由于“历史常识”对观察视野的限制，我们对此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受历史强势话语的遮蔽，对一些有可能改变我们历史常识的细节视而不见，从而影响了对社会和思想转型期微观运作的体察。虽然本书最为用力的研究内容大都集中在庆历三、四年之间，但是这样短的一个时段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有着自己的前生与来世，因此在研究中笔者采用“庆历之际”这一较宽泛的时间概念。作为北宋政治文化发展和转型期，“庆历之际”有着一定的独特性。庆历士风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庆历诸贤那种“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时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的政治风气和君子人格的张扬，成为后世文人官僚的理想楷模。这样的一种文人执政模式为什么会出现在庆历之际？文人们的参政热情又是如何穿透自己脆弱的心理底线？笔者认为，庆历之际士风高涨是唐宋士风转型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是自宋初以来文人地位不断提高、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士风高涨之所以发生在范仲淹、欧阳修们的庆历之际，也确实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据笔者前期研究，所谓庆历士风的核心内容，是“和而不同”的文人政治伦理之树立与张扬，和

“笃于自信”的文人主体意识之培育与践履。庆历革新诸贤站在时代的前沿,无论其事功文学还是其自身人格魅力,都为后世文人所景仰,不过笔者要追问的是,即使他们能代表庆历士风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部分,但他们能代表庆历士人的全部吗?研究庆历士风产生、嬗变与没落,或许比研究庆历士风本身更有价值,这样的研究会引导我们对转型期士人心态有更细致入微的体察,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历程,有更为客观的了解与认识。

“士风”,一般是指特定时代士人群体的普遍行事方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等。对“士”的不同理解,可能会对“士风”的理解带来一定的偏差。本文所谓的“士风”,更强调在特定政治文化影响下,士人心灵世界的变化及其在行为上的呈现。这里的研究对象包括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文人,在宋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是指与“武人”相对应的另一社会政治群体,他们是“士风”研究的主体。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政治评价与道德评价界限的模糊,为我们研究千年前的士风与文学设置了重重迷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庆历之际虽然有几次党议事件,但学界基本上已公认庆历年间有党议而无党争,或者认为虽然有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分野,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党事件发生。由此笔者又联想到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庆历士风引起后人的艳羡,但是为什么文人政治并没有由此进入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轨道,反而在庆历之后的数十年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党争事件?不少史家认为“元祐党争”肇端于庆历,那么这种“有以启之”如何发生,有没有痕迹可寻?这样的痕迹是偶然现象还是庆历士风内在的颠覆因子所致?其二,庆历之际的革新与保守是政治之争还是道德之争,在庆历政坛上是不是形成了两个稳固的阵营?历来被斥为保守派的官员,他们在庆历政坛上的历史作用如何恰当评价,他们对士风建设有没有自己的贡献?这些问题都曾给笔者带来很多迷惑,随着一步步接近庆历士人的心灵,一个更加丰富多

彩的庆历士人群体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追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我们或许并不熟悉的庆历。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上半叶,陈寅恪、王国维、章太炎等著名学者对宋代文化和文学做出过较高评价,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二十世纪中期我国宋代研究进展不大,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少有突破性的成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宋代文史研究逐渐繁荣,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也是对二十世纪早期宋代研究的学术呼应。

近年来宋代文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有关宋代研究的基本资料和学术著作大量出版,特别是三百六十册《全宋文》的问世,标志着宋代文学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近年来,古典文学渐渐突破以往的研究模式,文人群体研究和文学、政治、文化之间的整合研究,以及对文人的心理心态研究、转型期思想研究等,逐渐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热点。宋学研究领域中,文学与政治、士风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不少优秀成果,如论著方面有《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北宋文人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从唐音到宋调——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等,获得学术界较高评价;论文方面,如《宋学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灵魂的悸动与嬗变:从唐宋诗之别看宋初士人文化心态》、《试论北宋仁宗朝前期的士风》、《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等,都给本书的写作以很大启发。王水照先生为查屏球《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所作的序,是一篇关于士风与文风研究的重要论文,先生通过对查著的细读,分析了作者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关于士风与文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与其他众多学术话题的回归一样，这也是对已中断多年的学术话题的回归。”“近年来，随着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论著的译介以及国际汉学界相关成果的不断引进，当代学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其学术方式与学术视角也有了较新的变化，研究的空间也不断扩大。由社会风气到士人心态，由地域文化到生活方式，研究内容也越来越细化。中断的学术命题不仅得到了延接，而且还滋生出新的学术活力。相对于先前强调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士风与文学创作关系更为密切，从这一角度认识文学史可深入地揭示各时期文学风尚的历史底蕴。”先生对士风与文风关系的学术思考，对本课题的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有关庆历士风的研究方面，诸葛忆兵在《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中认为：“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他从范仲淹这一个案研究入手，折射出整个北宋前期的士风演变进程。马茂军在其论文《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中指出，宋初的士风和文人心态是一个研究者们忽视的研究领域，“在宋初的 100 年里，道德节义观念缺位。宋初百年士风演进的过程，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是道德逐步振兴、士风由颓废消沉逐步走向高昂的过程；是从节义观严重缺失到逐步道德化的过程，也是从人格委琐逐步过渡到以风节自励、以名节相高，士风从循默简静逐步成长为慷慨激昂的历程”。张兴武的《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文学遗产》2006 年第 5 期），从北宋前期的思想史

背景入手,探讨了由宋初到嘉祐的文学思想发展脉络,并对庆历时期给予高度重视,他认为“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彻底改变了儒学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儒道的价值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以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和尹洙等人为代表的庆历作家群体,广泛借鉴前人经验,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在熔铸锻炼中极大地提高了诗文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充分展示出文道传统修复之后的绚烂景象”。

庆历文学研究方面,马东瑶发表于《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的长文《论北宋庆历诗风的形成》,是关于庆历文学的一篇重要专论,作者认为“庆历诗歌是宋诗初成面目的时期,在宋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庆历时期主要诗人的作品“都具有了各自的风格特色,使庆历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同时,在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中又体现出一些相同的审美倾向,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并存于庆历诗风中的少年气象与理性精神”。但是,“繁荣的背后已渐显重重危机,冷静的思索逐渐取代了满腔热情,作为新的审美追求的理性精神在诗歌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发展为宋诗最显著的特点”。作者总结出庆历诗歌的主要特点,“内容与时政密切相关;立意命笔、章法布局追求思深笔折,语言上力避陈熟,语意上则力求畅达;诗歌的气魄宏大;精神上则体现出特有的人文关怀”。并进一步断言:“庆历诗歌是宋代诗歌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代诗歌,诗坛的繁荣和成就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宋诗的第一个高峰。”在庆历散文研究方面,洪本健先生发表于《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上的论文《庆历新政人士和北宋散文的发展》颇值得注意,文章认为:“发生在中国11世纪40年代的庆历革新,虽然只历经短暂的岁月即告夭折,但它给弊政丛生的北宋朝廷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也对北宋散文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新政人士”的散文创作不仅在庆历期间很有影响,在庆历新政失败之

后,欧阳修等人各赴贬所,从政之余,潜心创作,指导后学,“政治变革的天折,并没有使文坛沉寂,反而带来了文学创作的丰收”。作者探本溯源,认为北宋嘉祐文学之辉煌,实肇端于庆历。马茂军近年来致力于北宋士风与文学研究,成果颇丰。他以“庆历党议”为研究背景,发表了《庆历党议与苏舜钦诗风的嬗变》、《庆历党议与梅尧臣诗风的嬗变》等学术论文,关注庆历文学的细部演进过程;其新著《宋代散文史论》中,专辟《庆历党议与庆历散文》一节,通过探讨了庆历党议的三个中心议题,呈现庆历散文的议政主题,并从“议政精神”、“纤徐委曲文风的形成”、“六一风神的形成”三个方面探讨了庆历党议与欧阳修的散文成就。此外,海外的宋代文学研究也成绩斐然,特别是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体现了近年来海外宋学研究的新成果,这些著作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北宋前期士风和文体递嬗问题,研究视角比较独特,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宋代文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学者们作了大量的学术贡献,开拓了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也时有创新。但不少研究因缺乏对北宋前期士风嬗变和文人集团的基础研究,往往不能更切近地把握此期士人心态变化及其在文学上的呈现,从而容易造成研究模式单一化、研究背景概念化、研究成果类型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复性成果比较多,造成研究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因缺乏积累和基础研究支持而影响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研究基础陈旧,文学研究缺乏相关史学研究成果支持,对一些历史史实及相关评价,大多采用数十年前的史学研究成果,较少进行具体政治、文学事件的考证;往往孤立地进行古代文学作品研究,忽略了“时、地、事、人”的综合研究,既缺乏古今贯通的宏观视野,也缺乏对文学演进的微观体察,没有呈现出北宋文学与文人心灵发展史的关联性。

三、对本书章节安排的说明

本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庆历之际’”。这一部分笔者将所谓的“庆历之际”置于整个北宋中前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庆历之际士风得以涵养和张扬的历史必然性。大量庶族文人步入帝国政权的核心地带,是北宋政治不同于以往王朝的重要特点,有着近代指向的文人政治成为北宋政治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庆历士风得以形成的坚实平台。但是北宋文人政治中的“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成为庆历士风裂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在考察庆历士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后,本章对庆历之际最关键的人物宋仁宗赵祯做了专门研究,指出庆历士风形成中的偶然因素。

第二章以发生在庆历三年的《庆历圣德诗》事件为基本考察对象,分析庆历士风的张扬与危机。本章考察了庆历士人中“笃于自信”的代表人物石介,通过石介这一个案研究,分析《庆历圣德诗》产生的士风背景,以及庆历士人中性格张扬、锐于进取的一面。笔者认为,文人地位的提高、儒家精神的回归和现实政治军事环境的影响,使文人的自我定位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不满足优渥的物质生活和雅致脱俗的诗酒风流,庆历之际生气勃勃的政治形势使他们有强烈表达自己声音的欲望。而这种表达不仅仅是一种伦理层面的政治关怀,更重要的是对当下发生政治事件的一种态度,体现出极强的现实性。笔者研究了《庆历圣德诗》传播与接受,并对“诗文干政”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文人政治传统做了详细考论。《庆历圣德诗》对庆历著名士人进行类型区分,一方面固

然显示了庆历士人的自律精神,另一方面也确实隐藏着巨大的政治伦理危机,这种危机很容易转化成庆历士风内部的颠覆力量。

第三章以发生在庆历三、四年间的“争水洛城事”和“滕子京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庆历士风的极致表现与裂变过程。“争水洛城事”是庆历士风和文人政治的理想标本,但现有的宋史研究中,并没有多少涉及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成果,对这一事件的基本认识大都没有超越欧阳修九百六十年前的看法。“争水洛城事”在当下宋代文史研究中的失语,不利于我们对“庆历士风”发展历程进行立体微观的剖析。笔者认为“争水洛城事”是庆历士风“和而不同”内核的精彩展现,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追寻,我们能更深刻地触摸到高涨士风下的历史背景。“滕子京事件”也体现了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核,只是在所谓“君子党”的话语建构和文学作品的遮蔽下,“滕子京事件”被贴上了朋党政治的标签。庆历士风的极致,强化了士人对君子人格的塑造和张扬。但即使被后世公认为君子人格典范的士人,也往往走不出官僚体系集体理性缺失的怪圈。士风嬗变与政治文化微观环境有重要的相关性,士风可能在某一时刻达到极致,但是古代士人固有的人格局限,又注定这种极致下潜藏着颠覆力量。古代文人政治的吊诡使士风发展最终偏离了历史逻辑,相对宽松的议政反而催生了文人政治的毒瘤——党争,但是“庆历士风”的精神价值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历久弥新,成为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四章以“进奏院狱”的历史解读为研究路径,探讨庆历士风与文人心态发展。发生在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虽然只是一个涉案金额很小的经济案件,但是却以其独特的影响力走入文人的精神世界。文人的散文叙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进奏院狱”来龙去脉的窗子,从其叙述过程中也可以发现士风内在的变异因子。但是历史的自身发展逻辑和文人的叙述并不总是等同,“进奏院狱”的过于政治化,是缘于叙述

者的朋党思维,道德人格评判代替了历史理性。历史、公正地解读“进奏院狱”,有助于我们认识庆历士人心态发展轨迹。专制政权中传统政治伦理的守望者,对文人独立人格发展的暴力矫正,为庆历士风奏响一曲挽歌,“进奏院狱”虽然没有完全改变文人心态和宋代文学走向,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它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笔者研究了苏舜钦的心路历程,以期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映射北宋文人的心态发展状况。苏舜钦虽然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因为他处在特殊文人时代的敏感位置,因此他的遭遇和精神生活更具有象征意义。

第五章为“庆历文学述略”。北宋庆历之际,是士人人格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中唐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思想交相辉映,深刻地影响了庆历士人们精神世界的构建。庆历士人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学内容的政治化倾向、文人价值取向的改造和文学作品内容的时代性上。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与“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内容,使宋代散文呈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自庆历之后,北宋主流文风由张扬而至潜沉,形成以淡雅、清静、旷远为本色的宋文格调。这种新的文风,浸润着宋人特有的冷静与凝思,在纾徐委备之叙述中,表达一种细腻而精巧的情感。“争水洛城事”过程中体现出北宋论兵之文的发展和变化,文人论兵之文中逻辑论辩力量和对现实军事政治的关怀,构成宋文重要的特色。随着文人官僚体制的进一步确立,迁谪文学的创作背景、创作心态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对现实、历史和文学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迁谪文学渐渐超越文学层面,而成为封建官僚体制下一个内涵及其丰富的文化现象。最后,本书选取庆历之际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品《醉翁亭记》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它的创作渊源和文学史价值入手,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中唐古文运动发生的思想史背景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两次运